

#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初智勇

**内容提要:**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关键词:**俄罗斯 安全观 对外政策 非传统地缘竞争

## 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俄罗斯的安全观存在某种或因其历史经历或因其地缘结构而形成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俄罗斯例外论,其中,特别强调一种天命或“弥赛亚”意识。这导致对于俄罗斯安全观的认知处于一种静态的现实主义叙事之中,对俄罗斯的政策选项也往往集中于战略层面的互动,从而对俄罗斯安全观丰富多维的内涵和历史演变的多进程可能性加以回避。

西方学界往往从性情论出发,以归因理论模式对俄罗斯的安全观进行解释。将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归因为历史与文化因素对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的塑造,忽视

\*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俄罗斯‘转向东方’背景下山东省参与冰上丝绸之路研究”(批准号:22CKFJ1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责自负。

其认知过程存在的情境式反应,因而,同时带有认知图式型偏见。

主流西方学者视俄罗斯的安全观,特别是对西方的安全观为“霍布斯意象”,认为俄罗斯总是基于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怀有深刻的恐惧与敌意,并基于一种“弥赛亚”意识具有某种扩张冲动。这种对俄罗斯安全观的认知,忽视了西方与俄罗斯的零和互动之于俄对外认知的建构作用,以及俄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区域的安全认知与观念的差异和变化。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sup>①</sup>、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sup>②</sup>、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sup>③</sup>、波波·罗(Bobo Lo)<sup>④</sup>等基本上都秉持此种论调。

中国学者往往侧重对中俄关系的动因、结构与功能进行观察与分析,主要采取地缘政治的视角与框架,对中俄关系背后的认知意象关注较少,同样忽视了俄安全观的建构色彩及地缘与维度差异。个别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的认知模式有所关注,但并未超越西方学界的主流认知偏好。<sup>⑤</sup>对俄安全认知与观念研究的刻板模式,导致其呈现静态化的倾向。

本文尝试从情境论视角对俄罗斯的安全观进行观察与分析,针对俄罗斯新安全观较之传统安全观的差异与变化,及其在不同环境与维度下的不同表象,探讨俄安全观随国际地缘格局与形势变化的演进趋势,揭示俄安全观的情境性与可塑性一面。

---

① 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源在于其内在的宗教式信念,其诉求指向全球主导地位。参见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25, No.4, 1947, pp.566-567, 569, 571, 572, 575。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本来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原野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生活没有保障,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参见“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475],” in Rogers P. Churchill and William Slany,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Volume V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699。

② 对于大俄罗斯的统治者来说,扩展自己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思维源于鞑靼人和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数百年的异族统治。[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③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非常“传统”,以19世纪旧的权力政治原则为行为指导。俄罗斯的行为取向是由它自身的历史所塑造的。苏联解体后“后民族国家政治”的失败塑造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态度取向,那就是恢复传统的民族国家与权力政治。[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页。

④ 即便如今的全球化背景与十七世纪的欧洲在本质上天差地别,俄罗斯的决策者仍然立足于霍布斯的思考所基于的一些假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在这里,强者更强而落后就要挨打。[澳]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65页。

⑤ 从地理环境、历史宿缘和民族心理来看,孤立主义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身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它所赋予俄国的,绝不仅仅是数个世纪以来与欧洲强国所进行的争夺;它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培植的精神基因,造成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长久隔膜和疏离。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37页。

## 一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

基于地缘不安全的历史情境,俄罗斯传统安全观认为外部世界是威胁的来源,俄罗斯被敌对力量所围困。地缘不安全的周边层面体现为边界领土流变,国际体系层面体现为大国安全博弈。与之相应,俄罗斯传统安全观也包括周边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上述二维安全观与俄罗斯的二维安全战略相关联。

### (一) 地缘不安全

俄罗斯重视周边、经营周边的安全观,基于边界的脆弱性与变动不居,奉行“以扩张为防御”的安全观念。俄罗斯与周边地区缺乏地理分界物,处于彼此易受攻击的地缘态势,加之与周边地区在民族、文化上的异质性,边界处于流变状态。边界的内收与外扩基于其内外的权力对比状况,而非民族分布的自然界限。领土边界的变迁体现了俄罗斯帝国主义与周边民族主义的力量消长。通过周边扩张战略,俄罗斯将周边的安全问题转化为内部治安问题,从组织上消除外部威胁来源,并剥夺其资源为己所用。如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ksandr Gorchakov)所言,出于安全与贸易的考虑,俄罗斯享有对处于落后状态邻邦的某种权利。如若放弃这一使命,则边界必然扰攘不安,舍此则需不断将扩张矛头深入蛮荒之地。但同时造成的困局即是至何处收手为宜?<sup>①</sup>

此外,俄罗斯从“七年战争”开始正式加入欧洲国际体系,其国运便开始与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紧密相连。而在“霍布斯意象”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首要目标是安全。特别是陆权大国之间,由于彼此存在预防性进攻的可能,必然存在激烈的安全竞争。因此,当俄罗斯加入欧洲国际体系之后,联合其他国家对欧陆潜在霸权实施制衡,成为其一贯奉行的安全观念。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认为,欧陆的潜在支配国与位于东部侧翼的俄罗斯总是处于结构性对抗状态,俄罗斯不会坐视其他国家取得大陆支配地位,否则,将对俄罗斯的生存与其在东欧的地缘利益形成致命威胁。<sup>②</sup> 俄联邦共产党总结俄罗斯对外关系史时指出,俄罗斯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始终是国际均势的重要保障。<sup>③</sup> 基辛格也认为,俄罗斯以其坚忍卓绝的巨大牺牲,数度力挽欧洲均势于既倒。如果没有俄罗斯,拿破仑与希特勒几近笃定建立世界帝国。<sup>④</sup>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②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Alfred A. Knopf, 1962, p.102.

③ 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134页。

周边与国际体系这两个层次的关系,体现了“以扩张为防御”与“制衡体系权力优势”这两个安全观念的互动。周边扩张能够扩大领土与人口规模,有利于俄罗斯在效率落后的前提下,利用资源禀赋的规模优势,与欧洲的效率型国家进行权力竞争,用规模优势弥补效率劣势。此外,从进攻与防御的地缘政治结构来看,周边扩张也有利于拓展纵深或构筑缓冲区,提升对国际体系其他强国的防御能力。但与此同时,周边扩张也涉及俄罗斯与体系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平衡:对过度扩张的自我克制,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维系制衡潜在支配力量的协调与团结;过度扩张则可能导致自我围困的局面,破坏制衡力量与体系结构的稳定,使均势结构向霸权结构转化的概率上升。

## (二)“霍布斯意象”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是现实地缘困境与传统安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基于地缘不安全的情境性因素的刺激,也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霍布斯意象”互动形成的性情性因素的惯性。历史上俄罗斯与邻国之间战争频仍,且成本与代价高昂,这种类型的互动模式,使俄罗斯对外部世界形成了“霍布斯意象”的文化认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指出,俄国占据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向各个方向进攻的便利,但同时也面临来自各个方向的进攻威胁。<sup>①</sup>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和马克·斯坦伯格(Mark D. Steinberg)指出,位于南俄草原的边境在数个世纪内都是开放的,成为亚细亚游牧民族袭扰的通道,西部边界同样易受攻击且处于流变状态,这些因素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的军事化。<sup>②</sup>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指出,俄罗斯历史上的邻国都极富侵略性,俄曾经被强大邻邦反复入侵,其中包括钦察汗国等鞑靼国家、土耳其帝国、波兰和统一后的德意志。<sup>③</sup>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如果说哪个国家有出于安全需要而建立欧洲霸权的正当理由的话,那就是苏联。30年内,苏联遭到德国两次入侵,德国对受害者欠下的血债难以偿付。任何负责任的苏联领导人都将不会放弃建立欧洲霸权的机遇。<sup>④</sup>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受控于恐惧的互动行为体,其关系的实质是高冲突性。受恐惧意象支配的世界,其冲突性高于受欲望或精神控制的世界。安全成为行为体的首要诉求,其目标和手段都基于安全的战略考

<sup>①</sup>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页。

<sup>②</sup>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

<sup>③</sup> [美]杰弗里·曼科夫:《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黎晓蕾、李慧容等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2页。

<sup>④</sup>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Norton & Company, 2001, p.198.

量,而非伦理的自然规范。行为体普遍追求物理力量<sup>①</sup>,战争的数量因对其破坏性的顾虑而减少,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再受传统机制的约束,因而,代价与破坏程度更高。<sup>②</sup>而历史性敌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sup>③</sup>此外,俄罗斯与周边及欧洲的文化疏离,使其在文化上孤立于所在的国际空间,加深了彼此的安全疑虑。同时,欧洲被俄罗斯视为值得学习的对象(用以提升自身的要素效率),周边也被其视为某种战略资源(富有资源的扩张对象及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缓冲区),但这仍未超越基于安全博弈的零和计算。

### (三)物理力量的整合

在上述前提下,国际秩序的稳定需要在大国物理力量结构方面构建精巧的平衡。此外,还需要大国之间存在某种底线共识,从而对破坏秩序稳定的因素加以克制。这显然符合俄罗斯这一国际体系中弱势大国(体系中的非潜在支配大国)的利益。

俄罗斯理想的国际安全模式是 19 世纪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协调。维也纳体系利用俄、普、奥三君主的保守共识形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同盟——神圣同盟,其运行机制即欧洲协调,既制衡法国的潜在支配力量对欧洲均势的威胁,又反对其宣扬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对君主正统权利和帝国领土现状的挑战。同时,通过同盟内的彼此牵制与自我克制,约束俄奥在巴尔干的扩张冲突,以防止破坏三君主的团结。

通过普京讲话及俄战略家的论述可以发现,对俄罗斯来说,未来世界最理想的状态是形成类似 19 世纪欧洲“大国协调”的格局,而俄则要成为这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要求确认二战遗产,并维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制,特别是保留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sup>④</sup>

在此前提下,俄罗斯的传统安全观受制于安全认知上的“霍布斯意象”,奠基于权力与共识之间的战略层面整合与平衡,包含四层内涵。

第一,外部世界是威胁来源,尽管彼此不乏合作,但冲突的意象始终存在,俄罗斯是一个被外部世界围困的国家。对外扩张能够从组织上摧毁周边的威胁来源,并将其转化为内部治安问题;纳入版图的领土与人口,也能够从纵深与规模上增进国家的实

<sup>①</sup> 物理力量是指以军事力量和战略及其资源基础为核心的实力因素,其中,作为资源基础的实力因素,包括国土、物产、人口等。

<sup>②</sup>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90-91.

<sup>③</sup> [英]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1 页。

<sup>④</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Май 2020, С.11,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33222/>.

力;有利于应对来自周边与国际体系的安全压力。

第二,硬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唯一可靠的手段。俄罗斯人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只有通过斗争摧垮敌人,才能获得安全,协定或妥协均不能保证安全。<sup>①</sup>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为军事能力提供物质基础,军事安全目标优先于社会经济目标。没有硬实力作为后盾,即使处于国际合作中,国家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亚历山大三世总结道,俄国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sup>②</sup>因此,俄罗斯很早就建立了一种军事动员体制,其核心机制是中央集权,以最大程度动员自身的社会潜能,构建强大的军事能力。通过对周边的扩张,增进自身的资源禀赋,构筑与相关大国之间的缓冲区,从战略层面对要素资源与地缘条件等物理因素进行整合。

第三,俄罗斯属于国际体系中的非潜在支配力量,因而需要时刻关注国际均势的变化趋势,以维持对体系中优势力量的制衡,避免体系结构从均势向霸权方向转化。俄罗斯对所在国际空间潜在支配力量的霸权图谋异常敏感,其大陆政策与英国如出一辙,即全力避免欧陆出现统一霸权。尽管俄罗斯在文化上处于与外部世界的疏离状态,但仍可以利用外部世界的内在矛盾与地缘上的后方地位,避免对己围困局面的发生。同时,为了应对体系潜在支配力量的威胁,应尽量避免因对外扩张破坏可能的制衡力量的团结。

第四,除对所在国际空间物理力量的均势整合外,俄罗斯还寄望并致力于相关大国的现状共识。尽管这种较低层次的战略而非认知层面的共识,仍未超越“霍布斯意象”的安全困境与零和博弈,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挑战现状与均势因素的潜在危险。战略层面的共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无政府的“霍布斯意象”,消除大国彼此之间的威胁与恐惧,却能通过国际力量对比、进攻与防御平衡、挑战或改变现状风险认知的协调或趋同,增进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平。这突出体现在亚历山大一世对神圣同盟与欧洲协调的倡议、维也纳体系下俄国对巴尔干出现扩张机遇的克制、俄国对德俄再保险条约的不舍、二战前夕欧洲集体安全计划的提出、苏德战争中对反法西斯同盟团结的维护、对二战后联合国制度安排的支持,以及冷战时期对美苏缓和的热望。

<sup>①</sup> “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475],” p.699.

<sup>②</sup> 因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关系陷入低谷时,普京曾援引亚历山大三世的这句名言。参见 Tass, “Putin Agrees with Emperor that Russia’s only Allies Are Army and Navy,” April 16, 2015, <https://tass.com/russia/789866>。

## 二 国际无政府的意象转化——超越霍布斯

如果说俄罗斯以往安全观中的国际共识成分仍停留在“霍布斯意象”下的战略层面的话,那么自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各类有利于降低大国安全焦虑和困境的政治安排、发展与技术因素、国际观念变迁,则使俄的传统(特别是本土)不安全程度有所缓解。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因可能在于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化为两极,美苏分别掌管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在美苏各自的半个世界体系中,是一种类似于单极的等级制秩序,这显然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国际机制的构建创造了前提。安全观中的共识成分超越“霍布斯意象”下的战略层面,向文化认知层面转化。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Игорь Иванов)在谈及疫情期间的国际关系时强调,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安全与发展的世界新秩序,有赖于将全球安全与国际利益置于个人抱负与国家利益之上。<sup>①</sup>“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度报告(2021年)同样强调,摒弃“人人为己”的做法,避免规则和制度崩溃导致世界“失控”,是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sup>②</sup>

冷战结束至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新安全观的一系列特征表现较为明显。但传统安全观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并成为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底线的基础。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安全观向传统回归迹象明显,其可能性有所提升。

### (一) 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动力与逻辑

事实上,尽管冷战时期美苏以战略恐怖威慑的方式相互依存,并维系国际体系的某种平衡,但是,国际和平机制的安排、人们获取财富方式的转变及对以战争作为政治延续的反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复能力、不对称战争的高昂代价等因素的累积,以及俄罗斯对苏联过度追求国际权力或过度承担“国际义务”教训的总结,仍然成为二战后国际制度、观念、战略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力动因,并最终促进了国际缓和。尽管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强调第三意象(体系结构因素)对国际政治的主导作用,但他同时强调,大国也不断地通过对外政策改变或塑造国际环境。苏联对外认知与政策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冷战以来的国际环境,尽管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受

<sup>①</sup>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Мир будет другим: Экс-глава МИД РФ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период пандемии,” 20 апреля 2020 года,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326474>.

<sup>②</sup> Олег Барabanов и др., Эпоха пандемии: год второй.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будущего//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Октябрь 2021, С. 28,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39314/>.

到国际环境变化的促动,如美苏之间战略互动的演进、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国际关系认知的变化等。国家对安全与利益的损益平衡进行再评估,国家特别是大国,其安全困境有所缓解,权力最大化和预防性战争不再是安全的必要条件,国际无政府的“霍布斯意象”有所松动,对外政策选择标准随之发生共变,不对称的有限权力,即能保证国家安全(特别是本土安全)的观念通过了逻辑与实践的检验。《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认为,后冷战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冲突。尽管美俄龃龉不断,美中为获取优势而角力,但以大国冲突的一般形态——战争、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来评估,大国冲突消弭是当今主导性的地缘政治现实。冷战结束多年后,日本与德国已成为排名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但依然是非军事大国。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虽然也致力于军事建设,但以历史标准衡量,它们显然更关注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提升。<sup>①</sup>有学者甚至将二战后(包括冷战后)视为“大国无战争”时代,并认为大国权力竞争的方式与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sup>②</sup>

国际体系压力的缓解使国家在可持续竞争力与暂时权力优势之间开始做出有利于前者的选择。苏联的内部结构变化和对外政策转变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恰恰出现在东西方缓和的标志性事件——赫尔辛基会议(1975年)之后。<sup>③</sup>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内部结构变化以权力扩散为核心,对外政策转变主要表现为摒弃传统的霍布斯式国际无政府意象。苏联的内部结构变化与对外政策转变基于体系结构压力的变化和 international 无政府意象的转化,是对其传统军事动员体制与零和安全思维的扬弃。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安全观继续以上述认知与逻辑为基础,安全在其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即使在新冠疫情、中美竞争导致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仍对大国和平保持信心。2022年1月,俄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Сергей Рябков)在“瓦尔代”俱乐部平台表示,无论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任何可能开展全面战争的风险都不存在。<sup>④</sup>防御型安全政策,即通过远低于对手的成本投入,维持具备有限但不可承受报复能力的非对称性战略平衡,在成本收益率与现实可行性

<sup>①</sup>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版前言,第25-26页。

<sup>②</sup>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315、318页。

<sup>③</sup> 激进改革最终导致政治转轨,也可能与过去对观念系统施以严格限制从而缺乏保留基本价值前提下的弹性变化(改良或修正)有关,当政治系统面临更大压力时,缺乏替代性方案,反而向对手的观念系统寻求出路。

<sup>④</sup>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外交部:不存在欧洲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2022年1月19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20119/1037179285.html>。



方面的优势受到青睐。这导致俄罗斯不再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与权力对称性战略均势,其内部结构与对外政策均出现较大转变,军事动员体制和权力集中有所松动,对外战略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事实上,俄罗斯的安全观自冷战后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来,较其传统而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俄罗斯传统安全观中的权力与共识的平衡标准,使共识维度由对战略平衡安排的补充上升到对战略平衡理念的超越。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尝试过克服大西洋共同体和苏联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目的是使冷战以各方共同胜利的方式终结,不仅是大国,还有身陷其中的所有国家。戈尔巴乔夫1988年7月6日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 CoE)的演讲中,提出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欧洲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这一泛欧洲共同体的抱负以“泛欧洲”(Greater Europe)的形式延续至今。改革的思想前提是,如果能克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冲突,那么自1917年苏维埃政权引起的国内政治斗争,也能被克服。<sup>①</sup>

俄罗斯安全思想对物理能力的重新强调,实际上是在应对办法有限的前提下,对西方遏制与打压的一种牵制和反击,也包括对民族分裂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其目标并非单纯指向军事和领土安全,对维护竞争力安全也是有所考量的。特别是自戈尔巴乔夫时代以来,这种意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叶利钦及普京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均有所体现。关于新冷战的说法,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Алексей Громько)认为,没有意识形态对抗,就不可能重新创造有利于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条件。如果新两极的想法站不住脚,那么新冷战的论点也就牵强附会,这曾被理解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政治—军事和金融—经济对抗的要素。冷战现象与苏美两极产生的战后条件密不可分。它的构成要素是众所周知的,但实际上还没有一个被重新创建。<sup>②</sup>甚至有西方学者强调指出,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基础是挑战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实际操作,而非内在原则,其目的是促使西方接受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多极与多元的世界秩序。<sup>③</sup>波波·罗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不仅不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反而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sup>④</sup>他指出,中俄无意寻求建立一

① [英]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0页。

②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ько, “Об иллюзиях новой биполярности,” РСМД, 5 мая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and-comments/analytic/ob-illyuziyakh-novoy-bipolyarnosti/>.

③ [英]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第58页。

④ 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194.

一个新的威权主义世界秩序。<sup>①</sup> 有学者认为,正是美国的遏制与制裁,促进了中俄之间的务实合作。<sup>②</sup> 普京时代,俄罗斯对国家主权和政权体制的珍视,对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的警惕,实际上都立足于为国家竞争力安全创造条件与保障。普京在第二任期之初发布的 2013 年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强调,俄罗斯要适应外部世界——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转型中的世界。<sup>③</sup> “瓦尔代”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茨基(Андрей Быстрицкий)在解读 2016 年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时指出,我们需要力量,没有力量,就无法应对“伊斯兰国”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威胁。同时,这应该是维持稳定、秩序,包括内部发展的力量,而不是征服和占领的力量,关键是防止邪恶发展。没有人需要也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重大冲突将破坏内部发展和全球治理。力量很重要,但要合理地认知和理解。<sup>④</sup>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方面始终面临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的困扰,并缺乏军事能力以外的优势。因此,在后苏联空间,俄有时会被迫采取军事手段,反击美国对其地缘空间的挤压。但俄对军事能力的运用,主要还是出于防御而非进攻目的,与其在帝国时代的进攻性、扩张性政策不可同日而语。普京在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发表的万字讲话,充分说明了此次乌克兰冲突与美国对俄政策(包括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乌克兰国内政治反俄化等)的深层次关系。<sup>⑤</sup>

综上所述,如果说俄罗斯传统安全观中的国际共识成分仍停留在“霍布斯意象”下的战略层面的话,那么自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各类有利于降低大国安全焦虑和困境的发展与技术因素、政治安排、观念变迁,则使俄传统不安全困境有所缓解。在俄罗斯的对外认知与观念中,安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不再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而是可以采取一种防御型的不对称平衡战略,安全观中的国际共识成分逐渐向文化认知层面转化。

---

① Bobo Lo,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Global Orde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2, No. 2, 2020, p.306.

② John M. Owen IV,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against Liberal Hegemon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No. 5, 2020, p.809, 812, 829; Deborah Welch Larson, “An Equal Partnership of Unequals: China’s and Russia’s New Status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No.5, 2020, p.790.

③ ГАРАНТ.РУ,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20 февраля 2013,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218094/>.

④ Андрей Быстрицкий и др.,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ам нужны друзья, а не враги,”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3 дека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vaya-kontsepsiya-vneshney-politiki/?sphrase\\_id=515672](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vaya-kontsepsiya-vneshney-politiki/?sphrase_id=515672).

⑤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的首要性,以零和博弈及相对权力损益为衡量标准。在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前提下,以自强或结盟的方式追求相对于对手的权力均势或优势。而新安全观突出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以复杂博弈及竞争力发展的综合前景为考量对象。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多元方式实现内向型发展,为国家构筑长远竞争力优势。

因此,俄传统安全观以权力导向为核心,关系导向<sup>①</sup>在战略层次服务于权力导向,突出权力的构建、配置与平衡,共识等关系类因素在其中仅发挥战略黏合的作用。新安全观则更加突出关系导向,权力导向因素只是为国家安全构筑底线,并维护竞争力运行与发展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国家竞争力的塑造主要依靠关系导向因素的整合与发展。俄罗斯在肯定联合国在冷战后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时强调,应在理性共识基础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与作用,以避免退回到由“本能”引导的权力政治时代。<sup>②</sup>

## (二) 俄罗斯新安全观的战略层面

俄罗斯新安全观的前提和基础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俄罗斯的安全认知与政策是,以有限权力构筑不对称的防御性战略平衡和周边核心战略区的力量均势或优势,以应对来自其他大国,主要是美国的传统安全威胁。

尽管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力量结构中处于极为悬殊的劣势。但是,俄罗斯仍可以通过防御性威慑,构建不对称战略平衡,确保主权和领土安全。同时,基于防御性战略的内线优势,俄仍有机会借助邻近本土的作战基地与平台,取得周边重要战略区域的力量均势乃至优势,以达到类似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防御效果。

此外,根据前景理论,与争取未定利益相比,行为体更倾向于为维护既得利益承担更大风险。俄罗斯多次强调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不惜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使俄罗斯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威慑承诺,拥有更高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使其不对称平衡战略的威慑效用得以提升。低成本的不对称战略平衡的构建,使俄罗斯可以在国家安全获得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超越国际无政府的“霍布斯意象”,以关系导向模式实现内向型的国家竞争力安全目标。

从传统安全竞争来看,俄罗斯新安全观还包括政权安全层面。俄罗斯历史上始终采取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社会和民众自治能力较弱,离开强有力的国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因此,确保一个普京式的强势政权的安全,对俄罗斯的未来是

<sup>①</sup> 关系导向是指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摒弃传统权力政治思维,着眼于相互依赖结构,以绝对收益为导向、利益交换为手段、利益共享为目标的行为模式。

<sup>②</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С.24.

一个关键问题。维护政权安全,在俄罗斯主要表现为采取外部威慑与内部治安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其他大国推动的“颜色革命”。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俄罗斯新安全观还包括领土完整层面。俄罗斯主要将领土完整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联系起来。尽管与之相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与大国安全和政治关系存在一定联系,如美国对涉俄民族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等。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变成独立主权国家,但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仍拥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其南部边境就居住着近 3000 万穆斯林人口。车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始终存在强烈的分离倾向,因此,俄罗斯仍存在民族分离主义危险,这对其未来战略地位及国家资源整合是一个巨大威胁。俄罗斯应对涉及领土完整威胁的方式,主要包括从内部综合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手段稳定外围民族地区,加强对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来源的控制与打击等。

事实上,针对上述威胁,俄罗斯目前基本实现了有效应对。在此前提下,俄罗斯可以将注意力与资源更多地集中到维护长期竞争力安全之上,相应地,长期竞争力安全的构筑也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上述安全威胁。

### (三)俄罗斯新安全观的认知层面

除了以有限的不对称平衡维护国家安全底线之外,俄罗斯的新安全观主要表现在以维护竞争力安全为核心的竞合观层面,具有以下四个维度的含义。

#### 1. 要素效率型模式——内向权力取向<sup>①</sup>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大国为维护国家近期安全的军事支出与保障国家长期经济基础的生产投资之间呈此消彼长关系,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维系国家当前安全与未来发展潜力之间的平衡,是摆在处于传统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sup>②</sup>而这一难题的出现,其逻辑基础即在于“霍布斯意象”下的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而二战后,大国安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使大国得以在两者之间做出有利于后者的内向型权力转移模式的选择。<sup>③</sup>

此外,国家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也促进了以要素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现实可行性。尽管传统领土型帝国的权力来源不乏要素效率因素的加持,但横向扩张仍然对其权力构成发挥重要甚至主导作用。而随着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

<sup>①</sup> 相对于以横向的领土扩张为积聚资源与力量的外向权力取向,内向权力取向是指以纵向的内部要素效率发展作为获取财富和实力的主要手段。

<sup>②</sup>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 1500—2000 年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天津编译中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49—651 页。

<sup>③</sup> 内向型权力转移是指通过内部发展获得相对权力优势,而非通过扩张与结盟的方式。

与管理的进步使要素效率在国家财富创造中所占权重愈来愈大,且几乎呈指数级上升,与之形成显著对比的是,领土与人口的算术加成对国家财富的直接贡献权重呈加速下降趋势。<sup>①</sup>

以要素效率为核心的发展维度,在大国权力构成中的占比愈来愈高。与过去权力(军事)导向的外向型扩张不同,突出创新驱动的内向权力取向,注重通过强化自身科技与管理水平,通过创新提升要素优势。

普京表示,俄罗斯应着力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未来经济部门,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以及开发北海航线,扩大与欧盟、中国的经贸及技术合作等。通过向私人资本、私营企业开放,促进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目标。<sup>②</sup>

2016年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在“确保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外,将“为可持续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强调“提高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技术更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以及“加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防止对俄罗斯商品、服务、投资的歧视,利用国际与地区经济和金融组织的能力实现这些目的”等。<sup>③</sup>

贝斯特里茨基在解读2016年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时指出,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支持俄罗斯国内发展,并促进其在国外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外交政策的作用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更轻松、更自由、更舒适、更富裕。<sup>④</sup>

## 2. 复杂博弈与竞合——合作而非权力导向

当今国际关系体现为复杂博弈,既存在相对权力导向的零和博弈成分,也存在绝对权力导向的非零和博弈成分,两者彼此夹杂交融,呈现为复杂博弈的状态。由于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获得基本保障,总体上呈现为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的长期安全竞争。此种竞争实际上是在以资源整合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基础上,在连接了国内与国际大循环的格局下展开的,因此,体现为一种竞合相融关系。

“瓦尔代”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研究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认为,紧密的联系和激烈的竞争不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是牢不可破的

<sup>①</sup> 尽管一国的领土、人口规模与其科技和管理进步可能存在一定作用条件下的正相关性,但这一作用条件往往复杂苛刻,导致在现实中,领土、人口规模与其科技和管理进步并不表现出直接而显著的正相关性。

<sup>②</sup> 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with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Participants,” October 25,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6717>.

<sup>③</sup>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0 ноя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sup>④</sup> Андрей Быстрицкий и др.,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ам нужны друзья, а не враги”.

共生关系的必要组成。合作与竞争相伴而生,并相互制约。直接和间接的制裁与反制裁将成为普遍做法。它们不一定是经济或政治博弈的终极武器,就像过去那样,这些对贸易的限制是在一个放弃集中规则的世界中调节关系的一种方式。<sup>①</sup>

在此种竞争力安全博弈前提下,传统的军事权力通约性下降,大国通过强权解决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国际议题的效果不佳,且代价高昂。俄罗斯精英认为,无论形成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其中的基本范畴必然是“力量”和“道德”,它们是自然的,根植于意识之中。同时,道德并不能仅靠武力来确定,这一点得到了武力实践的证实:拥有压倒性权力优势的美国及其盟国并未能在冷战之后建立一个单极世界。<sup>②</sup>相较于硬权力的逼仄局促与捉襟见肘,软权力的协调与引导效用益发凸显。共识基础上的关系而非权力导向,成为更适应当今国际关系内涵与特征的、富有启发性与吸引力的行为模式。<sup>③</sup>

正如卢基扬诺夫所言,我们必须摒弃世界可以建立在权力金字塔之上的幻想,显然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单一模型的框架内解决。世界正面临一个不同寻常的挑战:在不诉诸统一或压制手段的情况下使其多样性合理化。由于存在无法克服的文化差异,统一是不可能的,而压制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并创造新的不稳定因素。<sup>④</sup>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小国家的民众都渴望政治上的主体性,并向本国精英表达了更多的独立诉求。其原因在于,全面信息化和通信手段的推广带来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传统领导者不再具有榜样的吸引力。<sup>⑤</sup>

卢基扬诺夫还提到,新秩序不是建立在战后旧秩序的废墟上,而是从竞争和相互依存的辩证结合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保留过去的成就,特别是开放性、相互丰富的可能性和克服发展滞后的能力。<sup>⑥</sup>

### 3. 利益收益标准——履约能力和绝对收益

国家长期竞争力构建需要在内部整合与对外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由于经济合作属于重复而非单次博弈,因此,为合作双方创造收益的履约能力,成为重复合作的前提

<sup>①</sup>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anuary 20, 2016, <http://valdaiclub.com/news/the-goal-is-to-streamline-chaos-and-rationalize-diversity/>.

<sup>②</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С.23.

<sup>③</sup> 软权力以对方的自愿服从与接受为前提,其实质也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导向型结构。

<sup>④</sup>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sup>⑤</sup> С. А. Караганов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Москва, 2020, С.20–21, <https://publications.hse.ru/pubs/share/direct/400865044.pdf>.

<sup>⑥</sup>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条件。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向深度与广度拓展,产业链等领域的分工愈发精细复杂,呈现资源—产业链—创新的联动循环。政治权力强迫交易与合作的空间愈来愈狭小,其收益与成本结构愈发带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嵌入经济合作联动循环网络的关键在于经济要素比较优势<sup>①</sup>,而非政治权力。

由于大国安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国家在合作中更加注重绝对收益的获取,而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有所下降。短期相对收益不平衡对长期国家力量对比的影响,及其与长久国运的兴衰之间,并不遵循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国家更关注通过合作实现社会目标、改进民生福祉、促进持续发展。这导致大国之间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有所缓解,以相对收益为取舍的不合作程度降低。<sup>②</sup> 由于并不担心相对收益不平衡会对国家安全产生现实的直接影响,国家对次国家行为主体的合作行为放宽限制,次国家行为主体在国家间合作中的作用愈加突出。而次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关注的显然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尽管国家仍然对相对收益的累积性比较关注,但较之于大国彼此动用武力可能性较高的时代,其对国家合作的破坏性仍呈下降趋势。

#### 4. 议题导向标准——流变性组织格局<sup>③</sup>

随着全球化及第三次科技革命向深度与广度拓展,全球分工体系也不断向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各类区域与全球治理问题,以支离破碎而非整齐划一的结构形式出现。同时,权力特别是硬权力的不可通约性,导致区域与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议题化而非中心化结构,“一事一议”的临时组合将逐渐取代同盟或伙伴关系的固化结构。区域与全球治理主体的合作表现出结构松散性、议题可选择性、承诺与行动的非关联性等特征。

在这样的区域与全球治理组织架构之下,新的区域与全球治理呈现出多元多维的动态流变,而非一元一维的静态阵营化特征。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僵化的关系形式,如联盟,不再能够适应这种复杂性。<sup>④</sup> 新的以议题为核心的灵活而非固定化的组织架构正在兴起,同时,区域与全球治理也迎来了多元化主体的时代,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或超国家)在其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功能与作用。“瓦尔代”年度报告(2021年)提

<sup>①</sup> 这种要素比较优势与既往相比,愈来愈带有系统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国家将诸多要素整合为系统能力的优势。

<sup>②</sup> 中美贸易战显然是受到美国精英的霸权护持倾向影响的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

<sup>③</sup> 流变性组织格局是指区域与全球治理架构因议题差异与隔离而形成的临时性、分散化的形态,有别于历史上的长期性、中心化形态。

<sup>④</sup> Андрей Быстрицкий и др.,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ам нужны друзья, а не враги”.

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是道德多元化的,缺乏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标准”价值观。<sup>①</sup>

卢基扬诺夫强调,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后冷战时代出现了问题,一种新的逻辑正在超越当前的混乱局面。系统试图平衡自身,即使与其组成单元的需求相冲突。曾经完整的系统正在变得不那么集中,变得更加分散和区域化。一方面,新兴的区域性大集团并没有互相设置障碍,而是选择保持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这种相互联系的规则不再具有普遍性,并且可能因组织而异。新兴世界拒绝统一、普遍接受的观点或“普世价值”。竞争已经蔓延到价值观层面,但不是为了最佳价值观的竞争,而是为了多种不同模式的共存。<sup>②</sup>

总之,在国家安全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之后,长远竞争力竞争将取代传统安全竞争,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内容。要素效率而非权力伸张、复杂而非零和博弈、绝对而非相对收益、流变而非固化组织,成为新地缘政治博弈或区域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内涵。在此种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关系导向有可能超越权力导向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俄罗斯外交部智库专家弗拉基米尔·涅日丹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ежданов)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指出,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另一种全球化模式,可以从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以更加公平、可控的方式实现对全球化的治理。<sup>③</sup>

### 三 新安全观的三维投射——区域安全政策

由于所处不同区域层次的权力结构、共识基础、战略环境的差异,俄罗斯的新安全观在不同区域层次的表现有所不同,分别体现为:对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式合作、对欧洲地区(特别是老欧洲)的战略融入式合作、对美国的战略稳定式合作、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式合作等,并形成差异化的区域安全政策。

#### (一) 对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式合作

俄罗斯周边地区——前苏联空间或独联体,是维护俄国家和竞争力安全的重要依托和基础。这些前苏联地区在历史传统、经济结构、语言文化、民族情感上与俄罗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俄罗斯拥有最大区域影响力的地区。如果在这一区域层次,

<sup>①</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Эпоха пандемии: год второй.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будущего, С.3.

<sup>②</sup>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sup>③</sup>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专家: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另一种全球化模式》,2022年1月17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20117/1037140769.html>。



能够实现一体化的资源与战略整合,将对俄构筑安全空间与复兴大国地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俄罗斯急欲在自身主导下推进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掌控该区域未来的政治与发展走向。

俄罗斯实现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手段,与沙俄时期通常采取的军事征服、政治施压与文化渗透等权力导向模式不同,主要体现为以利益交换和共识构建为主的关系导向模式。但在客观国际环境的压力之下,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其他有效手段可资运用的俄罗斯,又不得不偶尔采取军事威胁和介入等权力导向手段,以维护俄在周边的地缘战略利益,时而导致俄在周边事务中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后苏联空间国家在沙皇俄国与苏联时期被兼并与同化的历史记忆,使这些国家始终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担心俄罗斯重新回到沙俄与苏联时代的周边政策,使自身的主权与独立受到侵犯。<sup>①</sup> 俄自身发展状态欠佳,引导地区发展的能力与威望不足,加之西方的干预与介入,使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愿景的落实常常捉襟见肘。而区域内国家也希望借助域外大国的介入,平衡俄对该区域国家的不对称优势,并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多资源与动力。

在此情形下,后苏联空间国家常常希望能够借助域外国际力量,如美国、欧盟、中国等,来平衡俄罗斯的区域力量优势,弥补俄推动区域发展能力的不足,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事实上,尽管哈萨克斯坦是后苏联空间中与俄罗斯保持较为友好关系的国家,但努·阿·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仍然在其当政时期引入大量西方非政府组织,并将哈油气利益的大量份额与西方分享,以此平衡俄罗斯对哈的影响力,从而维护哈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但这也成为哈萨克斯坦2022年年初乱局形成的重要催化因素。因此,俄罗斯改变了视该区域为后院并防范其他大国染指的传统安全观和政策,希望通过其战略协作伙伴(如中国)有限度的参与,阻遏西方对该地区的渗透与影响,并为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提供助力。同时,又希望中国在中俄战略协作共识的前提下,尊重俄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与地缘主导地位。这在中亚地区突出表现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之间的所谓“带盟对接”上。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二年(2014年5月29日)出台,对于中国在中亚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反对该倡议与中亚主权国家直接对接,而是希望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sup>①</sup> 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兼具以党的一元化体系组织起来的权力导向模式和关注地方利益与诉求的利益关照式的关系导向模式。

## (二)对西方的差异化战略合作

俄罗斯对西方的合作呈现出明显的分异,对欧洲地区(特别是老欧洲)采取的合作方式是追求战略融入,对美国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保持战略稳定。俄将融入西方安全与发展进程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欧洲,对美国则主要是争取在两国之间至少构建底线水平的战略稳定。

美国将俄罗斯建构为外部威胁,并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打压,主要并非出于安全需要,而是基于霸权护持的考虑。这样既可以防范俄罗斯的再度崛起,也可以为领导欧洲提供合法性。对于欧洲来说,并不存在霸权护持的考虑,俄乌冲突前,欧洲(特别是老欧洲)对俄关系主要出于经济利益和竞争力安全考量。

当国际局势紧张、呈现“霍布斯意象”的时候,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异质意识形态国家彼此存在两种威胁路径:一种是传统权力政治形式(军事入侵与威胁);另一种是内部颠覆形式(通过鼓动、支持反对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对持另类意识形态的邻国的恐惧,使彼此存在冲突的意象。因此,国家愿意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放弃获取经济收益的机遇,并承担相应的对抗成本。虽然出于形势所迫,如面临另一“邪恶”国家或集团迫在眉睫的威胁,也不排除彼此进行机会主义合作的可能,但冲突的意象是始终存在的。

自冷战结束至俄乌冲突前,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国家安全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特别是国际关系从整体上开始突破“霍布斯意象”之后,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脱钩”,使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显著下降。尽管美国一再试图组建围堵中、俄的价值观同盟,但并未达到其预期战略目标,其欧洲传统盟友与美国对此是存在战略认知差异的。葛罗米柯认为,在当代世界,意识形态对抗已成过去,价值差异逐渐消失,现实政治和地缘政治正在重现。<sup>①</sup>

俄罗斯的国内观念与体制虽然仍与西方存在对立与冲突,但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大搏杀仍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欧洲对俄关系更多是出于一种收益平衡和竞争力安全的考虑。<sup>②</sup>

国际局势缓和时期,国家将不再愿意承担意识形态对抗成本,否则有悖于突破“霍布斯意象”后的收益平衡与竞争力安全原则。虽然国家竞争力博弈也存在零和的场域和内容,但这种零和博弈是以合作框架而非对抗框架为载体的,其朋友与对手的

<sup>①</sup>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ько, “Об иллюзиях новой биполярности”.

<sup>②</sup> 这在德、美关于“北溪-2”天然气管道问题的争执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但俄乌冲突后,在美国的战略操控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再次上升,意识形态正在重新与国家安全“挂钩”。

划定将是变动不居和议题导向的,计算的基本考量是成本收益和履约能力,而非力量和观念结构。

俄罗斯精英认为,模糊的西方实际上正在蜕变为一个以华盛顿和欧盟为中心的双核结构,已经处于战略脱钩的进程中。<sup>①</sup> 在此种国际背景下,俄罗斯对西方的安全观呈现差异化的两个层面。

其一,俄罗斯试图与美国至少维系底线水平的战略稳定,以改善俄国际安全、政治与发展环境,为俄罗斯实现内向型竞争力安全转向创造必要条件。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率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异常严厉的经济制裁。但2015年4月16日,普京仍然声明,俄罗斯不将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敌人。我们始终主张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为了恢复与西方的关系,莫斯科希望以尊重为基础,恢复正常关系最重要的是尊重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不会因西方的冒犯而愤怒并孤立自己,尽管与一些国家的立场不同,但俄已做好与西方合作的准备。<sup>②</sup>

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之后,普京表示,为了维护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在权衡《中导条约》废止后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的基础上,愿意与美国进行相关对话与谈判。<sup>③</sup>

俄罗斯对北约五次东扩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直至北约欲将乌克兰吸收为其成员,而这意味着北约可以将进攻性武器直接部署在俄罗斯“家门口”。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已经与西方就乌加入北约和在俄周边部署进攻性武器等一系列涉及俄安全底线的问题进行谈判,但均无果而终。俄罗斯如不抢先采取行动掌控乌克兰局势,届时只有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安全底线。<sup>④</sup> 尽管西方在俄乌冲突中不断出台对俄制裁、升级对乌援助,使俄对外合作、经济发展、财政平衡遭遇严重困难,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挫折,给俄罗斯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但是,在2023年新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俄仍表示愿在俄美之间维护战略平衡,并与美国和平共处。<sup>⑤</sup>

<sup>①</sup>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ыко, Расколотый Запад: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Евroatлан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 4, 2018, С.9–12, <https://instituteofeurope.ru/images/stories/structura/gromyko/2018/4.pdf>.

<sup>②</sup> Tass, “Russia Regards No Country as Its Foe—Putin,” April 16, 2015, <https://tass.com/russia/789857>.

<sup>③</sup> В.Путин,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м выходом США из Договора о ликвидации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августа 2019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271>.

<sup>④</sup>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sup>⑤</sup>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其二,俄对欧洲的安全观表现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前提下的嵌入式经济合作与政治缓和,为俄塑造长远国家竞争力获取资源。

美国通过炮制“俄罗斯威胁论”,试图利用新欧洲对俄罗斯的地缘恐惧,以及新老欧洲对俄观念与政策的分歧,达到对外遏制俄罗斯、对内掌控欧洲的战略目标。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拉拢、扶植新欧洲,对抗俄罗斯,并将老欧洲捆绑在这一进程中,以实现对其的掌控。在此种地缘政治背景下,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但俄罗斯并未放弃与欧盟开展合作的任何现实机遇。

早在2012年10月第二任期伊始,普京便承认,由于国家规模与经济组织方面的问题,俄罗斯加入欧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他仍强调应该寻找和解的方式,促进俄欧的协同与合作。他指出,如果能够将欧盟的技术能力与俄罗斯的资源潜力结合起来,将产生巨大的整合效应,有助于提升欧盟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力。<sup>①</sup>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但即便在双方关系进一步疏远的情况下,俄罗斯仍没有放弃改善双方关系的努力。2015年,当俄罗斯与欧盟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之时,俄常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奇若夫(В.А. Чижов)仍表示,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对话,一旦欧盟重新评估对俄合作价值,俄愿意重新开启谈判和合作进程。<sup>②</sup>“纳瓦利内案”之后,俄罗斯与欧盟相互指责并采取制裁与报复措施,但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С.В. Лавров)仍强调愿意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寻求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与欧盟实现关系正常化。<sup>③</sup>此外,俄罗斯还在与欧盟外交关系中断的情况下,继续与欧盟进行能源合作,包括推进“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在2023年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尽管强调将消除来自不友好欧洲国家的安全威胁,但同时也强调,对独立自主、放弃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来说,仍存在通过对俄合作获取国家利益的空间。<sup>④</sup>

### (三)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式合作

中俄战略协作是在双方保持完整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双方的机制建设不是以主权让渡为前提,因此,其紧密性似乎不及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式(主权让渡型)战

<sup>①</sup> 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with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Participants”.

<sup>②</sup> Постоя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союзе, “Интервью В. А. Чижова газете ‘Коммерсан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е 26 июня 2015 года,” 26 июня 2015 года, <https://russiaeu.ru/node/1923>.

<sup>③</sup>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外长:莫斯科准备与欧盟关系正常化 但必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2021年5月28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10528/1033786727.html>。

<sup>④</sup>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略合作。这可能也是一众西方学者认为中俄战略协作缺乏协调性的重要原因。<sup>①</sup>

但是,中俄在共同感兴趣议题上的自愿合作,与欧盟将所有议题捆绑起来构建一整套机制的固化模式相比,可能更具灵活性与效率。英国脱欧的原因之一即是欧盟束缚了其在移民、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欧盟框架内新老欧洲的分裂,加之欧盟协调一致的议事规则,导致欧盟议事效率低下,提升了其未来解体的风险。

中俄主权保留型战略协作,较之欧盟的主权让渡型战略合作,更具有议题导向和组织流变特征,可能更加适应当今国际形势的内在特征与发展趋势,如内向权力取向、非权力导向、绝对收益标准等。

关于中俄战略协作,国际关系学界曾流行一种现实主义观念,即一旦西方改变对俄立场,中俄因地缘邻近而存在的战略利益冲突将会凸显,中俄战略协作会被严重削弱甚至瓦解。<sup>②</sup> 美国国内的联俄制华论即以此为逻辑依据。

但是,即使运用反事实分析,也能得出中俄战略协作不会因西方对俄战略压力减轻而受到冲击。<sup>③</sup> 中俄战略协作经受了中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考验,就足以证明这一逻辑不适用于对中俄战略协作的解释。

事实上,中俄战略协作不仅没有因中俄实力差距拉大而削弱,反而越来越稳定,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邻国敌对意象的假设,标志着中俄之间已经形成超越战略层面的认知共识。

没有超越战略层面的共同认知,即便中俄同时受到第三方力量的挤压,也不会彻底消除彼此的恐惧与敌对意象。历史上的苏德关系便是明证,苏德战争爆发前,两国同时受到主流国际势力的排斥而被边缘化,双方还拥有《拉巴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下的十年修好,但仍未能阻止两国兵戎相见。而德国对苏开战的理由是预防性的,即在苏德两国的国力增长预期方面,德国处于暂时占优势未来居劣势的状态。

<sup>①</sup> 参见[美]理查德·怀兹:《中俄安全关系:既非伙伴关系又无热忱的战略平行状态?》,载[美]戴维·J. 罗杰森编:《中国与俄罗斯:竞争与合作》,夏庆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9、117-118页;[美]伊丽莎白·威什尼克:《对中、美、俄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的展望:处在格鲁吉亚危机阴影之下的三国关系》,载[美]戴维·J. 罗杰森编:《中国与俄罗斯:竞争与合作》,第133、187-188、189页;Bobo Lo, *A Wary Embrace: What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Means for the World*, 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 2017, pp.xiv-xv, 21-22; Jeffrey Mankoff, "Russia's Asia Pivot: Confrontation or Cooperation?" *Asia Policy*, Vol.1, No.1, 2015, p.66。

<sup>②</sup> Alexander Lukin, *China and Russia: The New Rapprochement*, John Wiley & Sons, 2018, pp.92-93; Marcin Kaczmarek,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Fellow Travellers in the West-Dominated World,"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6, 2018, p.1200。

<sup>③</sup> Dmitry Suslov, "Missed Opportunities: Could a U.S.-Russian Dialogue on Asia Pacific Have Prevented the New Cold War?"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10, No.4, 2018, pp.661-662; Alexander Lukin and Dmitry Novikov, "Sino-Russian Rapprochement and Greater Eurasia: From Geopolitical Pole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12, No.1, 2021, p.41。

有西方学者认为,即使中俄实力差距出现有利于中国的逆转并快速拉大,俄罗斯对中俄合作的现状仍然感到满意。<sup>①</sup>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于2012年开始放缓,普京仍然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强调这不会阻止俄罗斯从长期战略角度发展对华关系,并宣布将进一步提升对华贸易额。<sup>②</sup> 尽管中俄合作的动力最初可能来自西方的排斥与遏制,但经过长期反复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超越“霍布斯意象”的认知跃迁与身份重构。

尽管这种超越霍布斯意象的身份认知与建构仍然存在可逆性,但至少就当今及可预见的未来而言,大概率是正向稳定或者继续提升的。<sup>③</sup> 双方领导人在2022年冬奥会开幕之际举行会晤,并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再次肯定了中俄战略协作在应对全球性威胁挑战、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的重要意义。<sup>④</sup> 2023年3月21日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强调,巩固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不受外部影响。<sup>⑤</sup>

#### 四 传统安全观的回归——动力与趋势

现实国际权力格局与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以及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的惯性,使俄罗斯安全观在相关行为体互动的基础上,继续发生动态演变。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身份互构,对俄安全观三维投射的进程与结果产生持续影响。西方对试图融入其安全一体化进程的俄罗斯,采取一种“身份”对立态度,并随着俄罗斯国力的逐渐复苏与独立自主外交的重新确立,而逐步升级。从奥巴马将俄定位为非建设性的地区欺凌者,<sup>⑥</sup>到拜登将俄罗斯视为“民主”的对手和“威权”的

① [澳]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第81页。

② 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with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Participants”.

③ 在务实合作方面,两国拟将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2500亿美元,并有意推进并扩大本币结算。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4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712>.

④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ступающих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и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стойчивом развитии,” 4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kremlin.ru/supplement/5770>.

⑤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ступающих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21 марта 2023 года, <http://kremlin.ru/supplement/5920>.

⑥ Jonathan Karl, “Obama Says Russia Is ‘Regional Power,’ Not America’s Top Geopolitical Foe,” ABC News, March 25, 2014, <http://abcnews.go.com/blogs/politics/2014/03/obama-says-russia-is-regional-power-not-americas-top-geopolitical-foe/>.

代表,<sup>①</sup>再到俄乌冲突爆发后,将俄界定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与民主制度的破坏者。<sup>②</sup>期间,只有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身份建构较为模糊,但在民主党和建制派的压力下,也无法实质性改善对俄关系。

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式”互动,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开始加速升级,直至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地缘挤压战略的层层推进,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极限压缩,当俄罗斯实施“绝地反击”之时,西方则回以经济制裁。对于俄罗斯脆弱的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GDP从2013年巅峰时期的2.29万亿美元下降到2021年的1.78万亿美元。<sup>③</sup>同时,西方还不断在俄周边推动“颜色革命”,试图颠覆俄政权。

在西方多管齐下、釜底抽薪的打击下,俄承受的战略压力激增。面对西方的外部挤压、内部颠覆,最初一厢情愿试图与西方修好的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强调独立自主,并被迫采取“一报还一报”的博弈策略。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始终试图与西方缓和关系,因此,并未采取全面对抗政策,而是采取了有针对性但程度有限的“报复”政策。在对西方保留谈判与合作空间的同时,俄罗斯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西方政策。俄罗斯开始推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内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外反对西方,其内涵是重塑民族自信和国家凝聚力,以此抵御西方的反俄战略。在外交上,俄罗斯开始转向东方。

随着俄与西方的“对立式”互动,双方的对立式“身份”建构,也由西方向俄单向输出,转为彼此双向输出,从西方单向对俄身份建构,转为俄与西方的身份互构。面对西方的“对立式”互动,俄罗斯对西方的身份建构,也开始依照敌意螺旋模式演进。由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与战略文化具有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取向和特征,俄对西方的对立身份宣示更不加掩饰。2015年版《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矛盾是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的矛盾。美国极力维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其他西方国家则积极在欧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美欧支持的违宪政变是导致乌克兰社会分裂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Zeke Miller, “Biden to Host ‘Summit’ to Rally Democracies over Autocrats,” AP News, August 12,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summits-65f950b3c11f3e8c6459f549058d3e37>.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 April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 Andrew Radin and Clint Reach, “Russian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May 18, 2017, p. x, 6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826.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826.html).

<sup>③</sup> 世界银行:《俄罗斯联邦概述》,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russian-federation?view=chart>。

及武装冲突的根源。<sup>①</sup> 文件直指北约为首要威胁:北约东扩及在俄周边的军事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同时,西方煽动“颜色革命”,并利用信息技术、大众传媒等工具影响公众意识和传统价值观。<sup>②</sup>

2021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西方国家对霸权地位的追求、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危机、国家间发展不平等加剧成为全球和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同时成为俄国家的首要威胁。对俄而言,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阻碍多边合作;对俄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挑动并加剧俄国内矛盾,破坏俄内部团结;分化分裂俄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挑动独联体内部分裂进程,爆发局部冲突和地区战争的风险加剧,导致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sup>③</sup>

俄乌冲突发生后,拉夫罗夫坦言,俄乌冲突是为了终结美国称霸世界。俄方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束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正在利用特别规则寻求霸权。他表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束北约肆无忌惮的扩张,并结束美西方国家毫不掩饰地希望全面统治世界舞台的势头。这些统治是建立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某些规则之上的。但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现在却大肆宣传要遵守这些规则”。<sup>④</sup> “瓦尔代”年度报告(2022年)进一步指出,美国正在失去超级大国地位,其霸权的影响所及正在急剧收缩,对外围国家只能采取胁迫或制裁的方式。<sup>⑤</sup> “瓦尔代”年度报告(2023年)着重强调,等级制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多极化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可能选项,并在稳步实现。<sup>⑥</sup>

正是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目的的战略部署,导致美国与俄罗斯的身份互构陷入“霍布斯意象”。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安全战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防止其他国家的力量接近或超越美国。为此,美国不断遏制和打压被其视为潜在威胁的对手。二是通过盟伴体系,变潜在竞争对手为受己掌控的盟友,并以此增进对其他战略力量的相对权力优势。俄罗斯之于美国,既是需要加以遏制的对手,又是美假以“威胁”欧洲,使

<sup>①</sup> 于淑杰:《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透析》,光明网,2016年2月3日,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6-02/03/nw.D110000gmrb\\_20160203\\_4-11.htm](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6-02/03/nw.D110000gmrb_20160203_4-11.htm)。

<sup>②</sup> 马建光、孙迁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及影响——基于新旧两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的对比》,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3期,第19页。

<sup>③</sup>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июля 2021 года, <http://kremlin.ru/acts/bank/47046>.

<sup>④</sup> RT News, “Russia Seeks to End US-dominated World Order-Lavrov,” 11 April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3674-lavrov-military-operation-us-dominance/>.

<sup>⑤</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Мир без сверхдержав//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Октябрь 2022, С.13,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43157/>.

<sup>⑥</sup>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Аттестат зрелости, или Порядок, какого ещё не было Фантазия о будущем без иерархии//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Октябрь 2023, С.4, 13, 16,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45987/>.



其甘愿接受美领导与掌控的地缘政治道具。因此,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美俄关系具有结构性冲突,也是美俄(苏)身份建构从冷战时期的“霍布斯意象”转向后冷战初期的洛克意象之后,又重新向“霍布斯意象”回归的决定性干预变量。

在全球化进程中,较之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甚至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同样具备战略性世界大国潜力的国家相比,其相对发展则不容乐观。这导致俄罗斯精英对传统安全观和对外政策的路径依赖欲罢不能。从俄战略思想的发展来看,自苏联解体之后,各类地缘政治思想几乎层出不穷,占据了战略讨论的大半空间。

在美国匆忙从阿富汗撤军并转向亚太之时,普京试图利用这一契机,在乌克兰取得某种地缘收益,以弥补俄战略实力的相对劣势,这似乎亦是俄乌冲突的深层动因之一。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前景因此遭到严重破坏,而俄欧合作曾是俄新安全观最为重要的内涵与目标之一。

这显现出俄罗斯在新旧安全观之间的纠结与两难:一方面,俄拟通过向新安全观的转向,适应全球化蓬勃发展时期的全球相互依赖结构;另一方面,各种内外困境,又迫使其不得不扬长避短,以传统安全观和对外政策作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如恢复大国地位、主导后苏联空间一体化、保持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平衡等。这导致俄在向新安全观转向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背离或退化的情形。而对传统安全观和对外政策的路径依赖,显然对俄通过向新安全观转向实现内向权力转移造成诸多内外困境。

在美国的推动下,当今世界重新向意识形态化阵营对抗回归,或将导致俄罗斯向新安全观的转向遭遇更大阻力,对传统安全观和对外政策的路径依赖可能重新在其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基于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排斥,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并未取得相对发展优势,俄罗斯对全球化始终持保守立场,在情感上也呈疏离或淡漠状态,这在俄罗斯的多极化世界构想中有充分体现。俄罗斯理想中的多极化世界是大国协调下的多中心化国际体系,在实质上类似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其特点是在牺牲小国利益的前提下,大国主导各个区域,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显然与全球化内蕴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相互依赖结构背道而驰。为实现这一理想,无论是制衡美国的实力优势,还是控制自身的势力范围,都需要在一定或相当程度上回归对传统安全观和对外政策的路径依赖,这显然将导致向新安全观的转向出现某种倒退甚至逆转。

俄乌冲突后,西方对相互依赖国际秩序基础规则的破坏,以及对自由贸易体系的解构与重组,导致全球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有人断言,全球化已经终结。而俄新安全观的动力与目标皆来自适应全球化的相互依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俄新安全

观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动力之源与环境基础。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与西方都试图通过提升武器的杀伤力在战场上获得优势。美俄双方都对贫铀弹,甚至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进行造势甚至解绑,无论其是否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加以运用,都将对核禁忌观念和政策形成严峻挑战,从而导致核威慑效用下降,这将严重冲击俄新安全观赖以形成的不对称相互威慑基础。<sup>①</sup>

在多因素复杂互动与博弈的国际形势演化中,俄罗斯的安全观呈现出近乎撕裂的三重维度:一是在对西方关系(全球和欧洲层面)中,向“霍布斯意象”回归。二是在周边(除乌克兰外)勉力维持洛克意象的竞合关系,但俄乌冲突显然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俄的恐惧,并试图通过战略自主或借力域外大国寻求平衡。面对这样的局面,俄也可能在利诱基础上采取更多胁迫方式,稳定自己在周边(特别是中亚)的地位,这将导致俄在周边的安全观,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洛克意象向“霍布斯意象”退化。三是俄乌冲突中西方对俄的打压,使俄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上升。但美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并在所谓“印太”地区全力围堵中国,可能对这一不平衡倾向产生对冲作用,进而使中俄关系仍然向超越“霍布斯意象”的方向连续演化,甚至有可能跨越洛克意象。

总体而言,由于现实国际环境与形势的差异和变化,对于当代俄罗斯的安全观而言,关系与权力意象在各个区域的性质与权重表现不同。但总体上,由过去欧洲多极体系和美苏两极体系的典型单一权力认知意象,向关系与权力的混合式认知意向转化。俄罗斯的安全观对美欧有所区别,对欧洲在不同维度,如安全与经济上又有所不同。由于美国的冷战思维与战略打压,俄不得不保留部分权力意象成分,表现为追求消极的底线式战略稳定,而对欧洲则更多体现为积极的融入式战略合作。在周边地区,由苏联时期中央对地方特殊需要的兼顾换取地方对中央的政治忠诚,向利益交换或互助型合作转化。在中俄战略协作中,双方超越了邻近陆权大国的安全困境,实现了后“霍布斯意象”式的战略合作。

## 结 语

俄罗斯已不再追求“弥赛亚”式历史终结性目标(无论是东正教救世主义,还是泛斯拉夫主义,抑或共产主义),其历史叙事的目标是借助其往日荣耀增强民族自信心

<sup>①</sup>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Ukraine,” September 6,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516840/biden-administration-announces-additional-security-assistance-for-ukraine/>;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Примене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может убереч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от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профиль, 13 июня 2023 года, <https://profile.ru/politics/primenenie-yadernogo-oruzhiya-mozhet-uberech-chelovechestvo-ot-globalnoj-katastrofy-1338893/>.

和凝聚力,强调一种内向型现状偏好;表现在其安全观中,不再是由外向型战略目标规制内向发展的结构与特征,而是为内向发展构建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与之相应,其认知文化亦由革命型转向保守型,安全战略由进攻型转为防御型。

由于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方式有限,出于情势所迫,俄罗斯仍然可能采取军事介入或威慑手段去解决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这种手段的运用,对俄通过关系模式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国际关系格局,将形成某些潜在的不良后果。

通过俄罗斯安全观的历史变迁及其基于不同情境的现实(三维)投射,可以发现,其对外政策随着战略环境与互动对象行为或意图的变化,存在很大的弹性,具有较为明显的可变性与可塑性。根据建构主义理论,随着行为体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的方向是可逆的。它既可能继续向突破甚至超越“霍布斯意象”迈进,也可能由于西方的遏制与打压,向传统的“霍布斯意象”回归。

中俄战略协作与传统的军事同盟不同,是适应俄罗斯新安全观的关系导向型对外合作的典型,在具备灵活性与务实性的同时,也存在随着地缘环境与形势而不断变化的可能性。为了巩固中俄战略协作,应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积极正向的互动,引导并塑造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动机与意愿,促进中俄战略协作广度、深度与强度的进一步提升,以夯实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与依托。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俄罗斯坚持国家基本制度与领土主权的底线,但其存在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强烈愿望。当西方在打压与遏制俄罗斯方面出现大幅度政策转向之后,可能使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俄罗斯有识之士对于西方对俄政策的变化,究竟是属于认知(身份)层面,抑或战略层面,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尽管在此种情况下,不排除俄罗斯对中国与西方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俄国内政治结构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但在当下,上述发展趋势尚未见端倪,未来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初智勇,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研究员。责任编辑:蔡雅洁)